

在空间中理解时间

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

Understanding Time
Within Space:

From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to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赵世瑜 著



博雅撷英·赵世瑜社会史作品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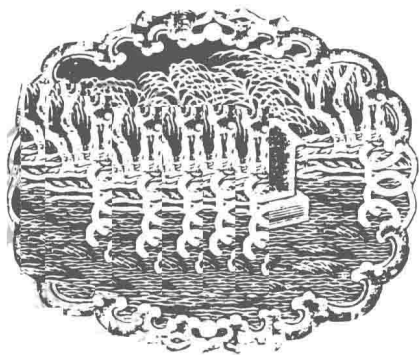
在空间中理解时间

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

Understanding Time
Within Space:

From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to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赵世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赵世瑜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

(博雅撷英)

ISBN 978-7-301-28884-9

I. ①在… II. ①赵… III. ①区域社会学—社会发展史—研究
②历史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8-09②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3511 号

书 名 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
ZAI KONGJIAN ZHONG LIJIE SHIJIAN; CONG QUYU
SHEHUI SHI DAO LISHI RENLEIXUE

著作责任者 赵世瑜 著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88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18 印张 480 千字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系香港“卓越学科领域计划”（AoE）项目
“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之一

目 录

叙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 1

以明清为基点：时间上的连续性

从明清史看宋元史

——倡导一种“连续递进”的思考方法 17

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

——社会史的视角 50

“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

——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 78

多元的时间和空间视域下的 19 世纪中国社会

——几个区域社会史的例子 103

“中心”·“边缘”·全球史：空间上的连续性

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 119

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131

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 155

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 183

连续性与“历史性时刻”：山西之例

晋祠与熙丰新法的蛛丝马迹 201

从贤人到水神：晋南与太原的区域演变与长程历史

——兼论山西金元时期与清中叶这两个“历史性时刻” 218

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异教”命运与晋东南社会的多样性 243

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 266

赤桥村与明清晋祠在乡村网络中的角色 303

族群、地域及其“历史性时刻”

“岭南”的建构及其意义 323

从草原传统到汉人文化的建构

——从明初军户的垛籍谈起 339

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 349

身份变化、认同与帝国边疆拓展

——云南腾冲《董氏族谱》(抄本)札记 369

图像如何证史：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 384

康熙《滇南盐法图》与山水地图的意义 415

亦土亦流：一个边陲小邑的晚清困局 433

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

——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 456

观察与思考

西樵山：近世广东史之景观象征

——读《南海县志·序》有感 479

锦屏—清水江文书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的意义 487

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 494

河东与河西：三十年来的新史学

——帕拉蕾丝-伯克：《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启示录 502

在历史中发现族群，于草野间审视朝廷

——读《帝国之于边缘——现代早期中国的文化、族群性与边界》 522

附录 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 531

后 记 569

叙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

一、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眼里的历史人类学

近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手逐渐取得较大影响,这种联手似乎因为有“历史人类学”这个国际上已经认可的冠名(无论是在人类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而迅速变得名正言顺。同时,这种冠以历史人类学之名的学科合作,产生了除理论之外一些重要的具体研究成果。

但是对历史人类学究竟应做何理解、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分支等等,学者间还有不同意见。十余年前,人类学家张小军批评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性”误解,又称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学家符太浩在他收于《历史民族志研究丛书》中的一部著作中,明确指出历史人类学“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决不是史学的分支”^①。在两部书名中出现历史人类学字眼的著作中,人类学家王铭铭认为,“为了克服功能主义对历史的漠视,显然要求新一代的社会人类学者在他们的民族志文本中重新提出处理历史与他们的研究主题——文化——之间关系的方案”,为了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探讨,即“人类学的历史化”,也即历史人类学。他把历史人类学定义为一种“学术风格”,其特点在于“在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中强调学者对于多种线路的历史的跨越”。历史学家张佩国则声称,“运用社

^① 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2003年4月),第1—28页;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页。

会人类学方法整合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学科领域的学术资源……这就是我所提倡并付诸实践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历史人类学不是单向度的学科,而是一种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①。除了明确表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内部自我反思之结果的观点外,其他人大都小心谨慎地避免把历史人类学收于某一学科的麾下,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还是认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问题意识应该是人类学的。

学科归属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历史学和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多是为了解决本学科内部学术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概念工具,重要的是这个工具对各自学科来说是否有效。被视为“新文化史”代表之一的罗伯特·达恩顿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历史学家们表面上是在一些大家不感兴趣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实际上他们是在帮我们跟古人沟通。想想人类有多少人已经消失在过去,他们在人数上远比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后代为多。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生体验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②

达恩顿并不在乎这个标签是叫“历史人类学”还是叫“文化史”,只要是意欲“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生体验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目的是“理解生活的意义”。那么,这样一个标签或者概念工具对于历史学或人类学是否有效呢?

^①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前言”第4页;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② [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第6—7页。

对于曾与已故人类学家格尔兹联袂授课的达恩顿来说,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也可以从前引书的最后一章中看出来。此外,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勒高夫看来,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并认为应使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并用“历史人类学”这个名称来概括它^①。而比尔吉埃尔则更为全面地讨论了他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历史人类学也许主要是与史学研究的某一时期相一致,而不是与它的一个领域相适应。”(这个表述与我个人关于社会史概念的表述极为相似。)他认为法国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研究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家庭史等领域,本质上是要通过研究各种习惯来了解各种权力关系。“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卓有成效的研究。”^②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倡导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借用人类学的关注视角和方法来改造历史学,来发现史学的一些新课题。

人类学家则主要是希冀以此作为探讨过去的手段。人类学家提出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是以批判用共时性和结构性概念统治人类学的做法为起点的,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便是伊万斯·普利查德(Evans Pritchard),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著作可以作为历史人类学的先驱。直至此后的70—80年代,“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风行一时,以至它们无疑已经建立了民族志报告的一种方式”^③。按照这些

① [法]J. 勒高夫:《新史学》,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6、40页。

② [法]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29—260页。

③ Marilyn Silverman and P. H. Gulliver, ed.,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译本为贾士骞译:《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21页。

人类学家的看法,历史人类学中有两大类,一是历史民族志,即利用档案资料和当地的口述史资料,研究过去如何导致现在,或进行对过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二是所谓对历史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history),即集中注意特定族群“藉以拟想、创造和再造他的过去,以至把过去和他们身处的现在联接在一起的各种方法和文化理路”,其中既研究过去的建构如何用来解释现在,也研究过去是如何在现在被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人类学几乎没有制造‘客观’历史的企图,相反地,它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些什么,如何记得,又为什么要记得,以及人们如何解释过去并和现在联接在一起。”^①

倡导历史人类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是萨林斯,他在一部讨论历史的论文集中说,“历史乃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并以文化的方式安排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情形千差万别。但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的图式也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因为他们在实践展演的过程中,其意义或多或少地受到重新估价”。尽管他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历史的建构,而不仅是静态的结构,结构与历史并非截然对立,因此强调历史如何改变了文化,但他关心的核心概念仍是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图式”,在其变化的过程中,历史只是一种方式,文化因这种方式出现了“结构转型”或“系统变迁”。由于历史的发展过程始终都是结构的,因此结构始终存在于历史中,探究的对象应该是处在历史中的结构^②。显然,这里的核心理念是“人类学发明”而非“史学发明”。

王铭铭的研究虽然努力按照历时性的逻辑框架讲述泉州或者其他地方的故事,但还是“把社会人类学近年对于历史的重新思考进行经验的叙述。其原本旨趣,在于开拓历史、文化、权力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空间”^③,一方面仍然具有人类学的本位立场,另一方面把历

① 西佛曼、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第25—31页。

② [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32等页。

③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第14页。

史看作是人类文化或社会中起作用的一个维度,这与史学家面前的历史是不同的。张小军则引述诸多人类学家的作品,认为在他们那里不存在人类学沙文主义,历史人类学是“结合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到历史研究,而不是相反,借史料论证人类学理论”^①。姑且不论“结合”何指,即说结合的一方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是笼统的“历史研究”,这是否意即,历史研究只是一种叙事文本,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与方法可以与人类学共享?

显然,人类学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人类学家的历史人类学是意识到人类学问题的回答无法脱离历史。但这并不等于是史学问题,史学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文化的系统与结构,更在于文化(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人类的各种创造)在时间序列中的进程。人类学可能更关心文化是怎样的,而史学则更关心文化是怎么来的;人类学更关心文化的构造,史学则更关心文化(或者生活)的历程,或即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方法上的民族志和文献、对象上的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精英、主客体关系上的内与外、意识形态上的国家意识与地方观念,都不构成人类学与史学之间的差别,差别在于它们提出的是共时性问题还是历时性问题。因此,史学家的历史人类学是意识到史学问题的回答无法脱离个人的生活、具体的经验感知和情境。

二、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与再结构过程

就此而言,华南研究的学者有比较明晰的表述。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所做研究的基础上,萧凤霞(Helen Siu)和刘志伟将他们的工作解释为对这一地区600年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的分析^②。我认为,这一术语可以作为不同区域历史研究共同的核心概

^① 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第13页。

^② 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本文中涉及这两位学者的引文,皆出自这两篇文章,不赘注。

念之一,也可以作为多学科区域历史比较的理论平台^①。

作为一个对历史有特殊偏爱的人类学者,萧凤霞将人类学核心概念之一的“结构”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而使言人人殊的“历史人类学”有了一个统一的概念工具。她对“结构过程”的含义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地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structure),而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作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将此表述还原到区域史的研究中,就是说,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认识特定区域内的个人或者人群怎样通过其有目的的行动,去织造出关系和意义的网络,也即制造出一个“结构”,其后,这个结构又影响着他们的后续行动。这个行动—结构—行动的延续不断的过程,就是历史。

历史学者刘志伟在自明初以来的600年历史中发现了若干重要的结构过程要素——沙田的开发、作为文化系谱的宗族的建构、神明体系在地方的建立、户籍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作为身份认同表征的族群之形成,等等。这些重要的关系网络涉及地理空间、村落形态、生业、市场、土地经营、社会组织与等级、族群分类、信仰仪式诸方面,后者则构成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结构。而这一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即结构过程)经由明初的军事征服、正统末的“黄萧养之乱”、嘉靖时期的礼仪改革、清初的迁海等若干时段,最后到清中叶以后,形成了我

^① 自2010年以来,我曾在若干场合提出这一看法,包括在台湾史语所等单位主办的闽南文化研习营、暨南大学等处所做《在空间中理解时间》的专题讲演中,都提及“结构过程”概念的意义,并提出不同区域内部的“再结构过程”问题。

们日后可以通过文献和田野观察发现的珠三角社会。而这一“可发现”的事实又证明了该社会对其后百年历史的影响。

在华南其他地区的研究中,各自作者虽然未必言明,但都揭示了各不同地区的结构过程,尽管它们经历的重要历史时段或有不同,结构过程要素也有差异。比如说,福建莆仙平原的开发可以追溯至宋代,木兰陂水利工程的修建,儒、释、道势力的博弈及民间信仰的正统化,都显示了该地区的崛起。相邻的广东潮州地区双忠公信仰的建立等的个案,也表明了当地自元代起与韩愈时代的分野。在这两个地区,明代中叶以后的海上贸易成为其结构过程中的重要结点。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后,台湾地区自明末以来也开始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序列,显而易见地,该地区的开发与前面三个地区的结构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我们按照华南研究的模式,将区域大规模深度开发作为该区域结构过程的表征的话,那么其他区域的这一过程显然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华北腹心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在东晋南朝至隋唐、洞庭湖与鄱阳湖区在南宋至元,而西南地区在晚明至清,东北地区在晚清民国——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的序列。如果这一多少有些粗略的概括符合事实的话,那么“先发”的区域在此后必然经过一个或数个“再结构过程”。也就是说,虽然同处于一个时代,但华南地区的明清,不等于华北地区的明清;华南地区在明清时期经历的结构过程,在华北腹心地区已早早经历过了,后者在明清时期所经历的,已然是新一轮的“再结构过程”了。如果承认这一点,做区域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就不会将明清时期的华北与同时期的华南或江南做简单的类比。

不仅如此,对于研究华北的学者来说,关注春秋战国以降的结构过程十分重要,关注此后的再结构过程也同样重要。这既是华南研究的启示,也是与华南研究之间的不同。或许,我们也可以只使用“结构过程”这个概念,即将某区域先后接续的若干过程各自独立看待,但这样我们会切断其间的关联。

近年来,人类学者黄应贵就“历史人类学”的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结集为《人类学的视野》一书^①,其中的《进出东台湾:区域研究的省思》与《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等文,专门论及这一问题。他试图提出“区域再结构”与“文化再创造”的课题,以其作为台湾研究跳出区域研究限制的概念工具。黄应贵将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视为导致区域再结构的直接动因,这些要素的流动造就了区域的新面貌,而这个“区域再结构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第163页),由此充分显示了他的人类学之历史化。

黄应贵之所以采用“区域再结构”的概念,还在于“过去汉人社会研究上所凸显的汉人在某区域的开发,其实是充满着汉人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只有将它视为区域再结构,才可能把汉人征服前的人类活动纳入其中,看到更多元人群与文化的互动、采借、结合与创造或再创造”(第215页)。因此,他的“再结构”之“再”就不仅具有时间变化的含义,也具有批判汉人中心主义、倡导多元互动的意识形态含义。不过,就后者而言,仅使用“结构”而不加“再”,并不必定导致多元文化观的缺失,即如学者们所研究的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沙田的开发者,就不仅包括了汉人,也包括了后来混同于汉人的疍民。

黄应贵的主张对于历史学中的区域研究突破原有框架颇有启示,而我们对带有汉人中心主义开发史取向的可能性也应采取警醒的态度。其实,当我们讨论某一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时,并不会将其视为最初的开发及文化创造过程,在这个结构过程之前,已然存在形成区域历史的各种人类活动,不过,为了与此后的“再结构过程”相区别,我们将某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定义为该区域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度开发,而且这一过程的影响可以在随后的历史中发现。比如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明初开始的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在现代社会

^① 黄应贵:《人类学的视野》,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承蒙黄应贵先生在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之际赠送此书,特致谢忱。

中看到,而且在此前是没有发生过的。相对而言,此前影响区域历史的结构性要素是个别的或者微弱的,甚至是潜在的。

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虽然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的时间段(time span)一般不甚漫长,而且就在最近的百年内,往往是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对历史学者来说,区域历史所经历的“再结构过程”可能不止一个,而且绝不止数百年之久。于是,试图揭示这些过程的历史学者将会面对更大的困难。他们不仅要像人类学者那样面对空间或文化上的他者,还要面对时间上的他者,这些他者的眉目一个比一个更模糊。而且,如果确定某区域历史的再结构过程不止一个的话,就需要确定原有的结构如何破坏、新的结构要素如何替代旧的。就此而言,由于学科的特性不同,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大体上是单数的,而历史学者的“再结构过程”大多是复数的。

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是向前看的,但历史学者的结构过程或再结构过程都是向后看的,难处就在于越向后看,材料就越少,结构性要素就越模糊不清,让人无法确定。以华北为例,我们不能像华南那样,从今天依稀可见的历史遗存中,结合历史文献去确定那些明代以来的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因为我们不仅看到有某些要素是明朝或清朝开始出现的,还看到有某些要素是宋朝或者元朝,甚至更早就存在了。因此,华北的研究就必然是长时段的。我们必须借助考古学的成果,同时对早期文献重新进行审视,力图发现区域历史早期的结构过程和再结构过程。这时,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引以为傲的民间文献和田野观察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但人类学的视野依然是重要的,这会使我们对古代历史提出新的解释。

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往往是通过观察现代社会去反观那个距离最近的结构过程的,因为眼前的种种现象,是这个结构过程的延续。我们或许也可以采用这种逆向的方法,去观察历史上的结构一再结构过程。比如,我们试图在明清时期的区域社会中发现前此某个结构过程延续下来的浓重痕迹,从而发现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结构要素,进

而把握该结构过程。相对于它,明清时期该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就变成了“再结构过程”。

区别某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和再结构过程,要看构成原有结构的过程是否中断;判断这一过程是否中断,则要看特定的区域人群是否在继续编织那个“关系和意义的网络”。同时,当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有人群或新的人群是否开始努力编织新的网络,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结构过程”。我认为,原有的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或者是近年来关于“变”与“不变”的讨论,也都可以在这样的理路下得到重释。

三、在空间中理解时间

历史学是一门关乎时间的学问,或者说,它是在时间长河中观察人类及其生活的流变。上文强调的“过程”,就是时限性(temporality)的体现。司徒琳(Lynn Struve)这样定义对时间的认识:

在或稳定或变动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经历时间,当我们思索过去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型塑”它。^①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一方面关注在相对的变与不变的时期人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的,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历史学家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关注人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怎样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那个曾经客观的时间流程,比如古代儒者提及“三代”这个时间标识的时候,是为何及如何赋予它特殊的含义的,再如今中外学者为何及如何进行历史分期,等等。

当然,即使我们像习惯的那样讨论不同时期的人们是如何经历时间的时候,问题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当我们论及人们

^① [美]司徒琳、万志英:《两卷本前言》,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赵世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页。